

## 遗存的宋代以降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刘道胜

〔内容摘要〕 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的各地民间文书相继问世,发掘民间文书的地域可谓“满天星斗”。总体而言,南方多于北方,特别以安徽、福建、台湾、贵州、浙江、广东等地居多,类型上以契约文书为常见。另外,历经时间和水火兵燹的洗礼,宋明间的民间文书颇有发现,尤以清代民国时期的民间文书居多。有关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已取得不少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并方兴未艾。

〔关键词〕 民间文书 发掘 整理

如众所知,20世纪初以来,随着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不断问世,自秦汉至唐宋时期的民间文书颇有发现。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不少颇具代表性的各地文书亦相继面世,宋元尤其明清民国时期的民间文书又先后大量被发掘。文书新资料的发现并由此带来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乃至新学科的产生构成20世纪我国学术发展之一重要方面。20世纪以来,随着不同时期各地民间文书相继问世,民间文书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史学及其他学科学者日趋重视利用民间文书资料从事相关研究,有关民间文书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已取得不少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并方兴未艾。笔者不揣浅陋,仅就一己之见,对20世纪以来所遗存的宋代以后各地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概况作一介绍和评述,遗漏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sup>①</sup>。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民间文书与地方社会研究”(08CZS005)的成果之一。

<sup>①</sup>本文所谓民间文书,系指宋代以后或由民间行用并于民间发现的,或收藏于各类馆藏单位而反映基层社会实态的原始文书档案。台湾学者将民间文书谓之“古文书”。日本学者或谓之“私文书”。另外,由于民间文书类型上以物权、人身、经营等方面的契约为大宗,故不少学者或称之为契约文书。实际上,民间文书亦不乏合同文约、信仰文书、继承文书、会社文书、赋役文书、诉讼文书、堆积账簿、日用类书、信函尺牍以及经由官府行移民间的告示、税契等。其中,既有约定性格式文书,亦有为保存信息即时记载的文本,其种类多样,故本文统称为民间文书。需要强调的是,与民间文书相对的是官文书(或谓之官府档案)。历代官文书大多留存于各级官府,然在赋役、诉讼、教化等方面,经由官府行移,能体现官府与民间关系,虽留存于各级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本文均归入民间文书范畴作考察。

## 一、安 徽

徽州文书。徽州(古称新都郡、新安郡、歙州)位于安徽省南部,宋宣和三年(1121)改称徽州,下辖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宋代以降尤其明清,徽州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致使公私交往频繁。徽州民间具有重视在社会活动中因时立约的传统,人们事无巨细,往往诉诸白纸黑字。在文书保存上,传统徽州具有强烈的文书保存的意识,尤其是大多数具有重要书证的契约,人们往往视为家珍。值得一提的是,在徽州宗族社会中,公匣制度是民间文书保存的重要手段和特色<sup>①</sup>。加上徽州山限壤隔,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以及历史上鲜有兵戈扰攘。凡此种种,使得徽州历史上不但产生了丰富的民间文书,而且大量文书长期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而被遗存下来。

徽州文书面世始于民国时期,当时上海、杭州等地书商和文人就经常到徽州来购买古籍,不少文书开始流出<sup>②</sup>。历史学家方豪成为最早收藏和刊布徽州文书的学者,他于抗战结束后,在南京地摊收集了一些徽州文书,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为专题,撰写了十余篇论文,刊载于台湾《食货月刊》(1971~1973)各期中<sup>③</sup>。20世纪50年代,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契约等文书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并被视为封建糟粕遭到大规模销毁,随即引起了有识之士和各级部门的重视。特别是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等的密切关注下,屯溪市新华书店专门开辟了古籍书店,负责收购徽州文书和古旧书籍,并开始介绍徽州文书收集情况<sup>④</sup>。当年古籍书

<sup>①</sup>参见拙文:《公匣制度与明清徽州民间文书的保存》,《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2期。

<sup>②</sup>翟屯建:《徽州文书的由来、发现、收藏与整理》,《上海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

<sup>③</sup>《明万历年间之各种价格》,《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4期,1971年7月;《明万历年间富家产业抄存》,《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5期,1971年8月;《乾隆五十五年自休宁至北京旅行用账》,《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7期,1971年10月;《光绪元年休宁万安某家人洋贺礼》,《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9期,1971年12月;《康熙时重新祠楼之文献》,《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1期,1972年2月;《乾隆十一年至十八年杂账及嫁妆账》,《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1期,1972年4月;《明代各朝契据四十二件抄存》,《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3期,1972年6月;《光绪元年自休城至金陵乡试账》,《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5期,1972年8月;《乾隆二十六年等赴六合事录》,《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7期,1972年10月;《道光咸丰光绪大婚事记》,《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11期,1973年2月;《乾隆二十二年汪朱氏丧事账》,《食货月刊》复刊第3卷第1期,1973年4月。

<sup>④</sup>1955年,上海古籍书商韩世保赴徽州收购古书,将徽州古籍文书流通和破坏的现状告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郑先生随即建议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设立专门部门收集和保存徽州文献和文书。

店负责人余庭光先生在宣传和抢救徽州文书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sup>①</sup>。据余氏介绍:当年“收购的契约总数约有 10 多万件。”<sup>②</sup>另外,原隶徽州,时属江西省的婺源县也随即开始了民间文书文献的收集工作<sup>③</sup>。屯溪市古籍书店把收集到的文书编制目录和价格,发卖到全国各地的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其中尤以北京中国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为主。通过这一渠道,徽州文书先后流传到了全国各地<sup>④</sup>。此后,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档案馆和安徽省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相继从徽州购买收集了一大批珍贵的徽州文书和地方文献。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徽州文书大规模发现和收藏一直延续到“文革”前。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徽学的兴起,徽州文书再次大规模被发掘。目前,关于徽州文书主要度藏情况详见下表。

①参见余庭光:《徽州发现宋元时代的契约》,载《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17 日;同氏:《歙县发现明代洪武鱼鳞图册》及《徽州地区收集到万余件珍奇资料》,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4 期;同氏:《屯溪又发现一批古籍》,《文物》1959 年第 4 期。

②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③参见贺华、金邦杰:《婺源县县委重视,文化馆带头进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6 期;王咨臣:《江西文管会在婺源收集了很多图书资料》,《文物参考资料》1959 年第 11 期。

④按:据余庭光先生回忆,当年屯溪古籍书店在收购古籍和文书同时,为便于发售,先后编印了十余期《古籍书目》,寄往全国各地收藏机构。日前,王国健先生经眼了部分《古籍书目》,并撰写了《徽州文书发现的重要见证》一文,承蒙惠示,谨致谢忱。笔者曾赴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上海图书馆等地查阅资料,发现所藏徽州簿册文书中均粘贴有“标签”,标签上印刷有红色格式文字“屯溪市古籍书店、书名、编号、册数、售价”。具体内容系墨迹手填。这些标签,应与当年编印的《古籍书目》密切关联。另,栾成显先生亦称:“历史研究所藏徽州契约文书,主要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中国书店购置来的,而中国书店则是从徽州屯溪古籍书店收购上来的。当时北京地区的徽州文书,多数是经中国书店之手转卖到各收藏单位的……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外,五六十年代北京购买徽州文书的主要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几家。”(参见栾成显:《徽学兴起亲历记》,该文承蒙作者惠示,谨谢)

徽州文书主要收藏情况表<sup>①</sup>

度 藏		数量(件)	备 注
馆 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500	
	中国国家博物馆	约 10000	
	中国国家图书馆	簿册数百种 <sup>②</sup>	散件不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4137	参见《徽州文书类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4000	以阉书等簿册为主
	北京大学图书馆	约 500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天津市图书馆 <sup>③</sup>	数百件	
	上海图书馆	/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4453	簿册为主
	南京市博物馆	/	该馆藏文书约三千件,徽州文书应占有相当比例。
	南京市图书馆	100	
	安徽省博物馆	4000	
	安徽省图书馆	3000	
	安徽省各级档案馆	90000	参见《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sup>④</sup>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11000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1000	
	黄山市博物馆	30000	
	黄山学院图书馆	60000	
	歙县博物馆	300	
祁门县博物馆	10000		
中国税文化博物馆	10000	黄山市地税局主办	
私 人 收 藏	王振忠	1 万数千件	其中珍稀稿本、抄本、簿册计 3000 件
	刘伯山	50000	
	翟屯建 <sup>⑤</sup>	10000	
	田 涛	/	田氏所藏民间文书 5 千余件,其中徽州民间文书占有相当比例

①上表中馆藏不详以“/”标示。表格数据,除笔者调查外,参考: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王振忠:《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新进展》,《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王国键:《徽州文书发现的来龙去脉》,《中国档案》2005年第7期;翟屯建:《徽州文书的由来、发现、收藏与整理》,《上海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卞利:《徽州文书的由来及其收藏整理情况》,《寻根》2008年第6期。

②如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即藏有徽州郑氏、程氏、洪氏、吴氏、黄氏、叶氏、汪氏等抄契簿(参见吴丽平:《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综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③关于天津图书馆所藏,参见刘尚恒、李国庆:《天津馆藏珍本徽学文献叙录》,载《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

④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档案馆藏明清徽州文书达 6151 件。休宁县档案馆藏有徽州文书 4158 件,其中有 1146 件系清代顺治四年至民国时期的全县鱼鳞图册。参见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

⑤参见翟屯建:《徽州文书的由来、发现、收藏与整理》,《上海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

上表所示的遗存数量在 33 万件以上,这仅是目前所知已发现的徽州文书较为明确的收藏概况。实际上,徽州文书在国内外不少馆藏机构和科研院所多有存藏是不争事实。如国家文物局<sup>①</sup>、南开大学、山东省图书馆<sup>②</sup>、浙江省博物馆和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以及日本东洋文库、东洋文化文化研究所<sup>③</sup>、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sup>④</sup>、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收藏部以及法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也收藏有徽州文书<sup>⑤</sup>。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昌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在徽州大力从事徽州文书的搜藏<sup>⑥</sup>。此外,国内外私人收藏徽州文书者亦不乏其人<sup>⑦</sup>,且大量徽州民间文书,仍深藏在有关单位,或散在民间,尚待发掘出来,这些不明数量的公私之藏以及有待发掘的遗存情况虽难以统计,然笔者粗略估算,至少有数十万件。因此,目前徽州文书遗存数量应在百万件以上是颇为可信的,并随着不断发掘以及整理公布,有关徽州文书遗存数量还将不断得以突破。遗存的徽州文书从宋代至民国各个时期均有发现,尤以清民国时期居多<sup>⑧</sup>。根据《明清徽州经济资料丛编》(1~2 辑)、《徽州千年契约文书》(40 卷)、《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上下)、《徽州文书》(40 卷)等资料集统计,时间较早的宋元明文书约 1 万件,如以最新估计总量 50 万件计,虽只占 2% 左右,但宋元明时期的徽州文书绝对数量非常可观,且历时性长,类型涉及基层社会诸多方面,因此,无论就数量还是价值而言,徽州文书当之无愧成为 20 世纪我国发现的民间文书之典型者和代表者。

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开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截止 2011 年),已出版

①据杨国桢先生调查,20 世纪 50 年代屯溪市搜集的徽州民间文书在国家文物局、天津历史博物馆、吉林师大图书馆等单位均有收藏。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②冯剑辉:《山东图书馆馆藏徽州文书述评》,《黄山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

③寺田浩明:《日本对清代土地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1989 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岸本美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 30 年》,《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2 期。

④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手札七百通考释》,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年。

⑤王国键:《徽州文书发现的来龙去脉》,《中国档案》2005 年第 7 期。

⑥笔者曾多次赴徽州调查,发现屯溪和休宁等地一些收藏者每年仍从徽州搜集民间文书数万件乃至 10 万余件不等,并不断发卖给一些高校等收藏单位。文中涉及的这几所高校近几年共从徽州搜集的文书数以十万计,此种搜集仍在进行中。

⑦据笔者了解,在黄山市县,私人收藏徽州文书万件以上者不乏其人。

⑧依据收藏情况不同,迄今发现的徽州文书的上限说法不一,主要有:(1)南唐保大三年(945)谕祭文抄件,参见王国键等:《徽州文书档案》,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1 页;(2)北宋庆历八年(1048),参见章望南:《祁门博物馆徽州文书征集及整理概要》,载《徽州文化研究》第 2 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10 页;(3)南宋嘉泰元年(1201),参见王国键:《徽州文书档案的特点和价值》,载《档案学通讯》2001 年第 1 期;(4)南宋嘉定八年(1215),参见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导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笔者认为,将徽州文书上限界定为南宋比较合理。其一,大量徽州文书的产生与南宋以后徽州的社会转型和发展繁荣密切相关;其二,宣和三年(1121),作为一府辖六县的徽州,其称谓和行政区划亦相对固定;其三,迄今发现的早期徽州文书以南宋居多。

的徽州民间文书资料集达十余种<sup>①</sup>。从目前整理出版情况看,已出版的徽州文书不到3万件,相对于已发现的现存数量而言,有关徽州文书的整理公布可谓任重而道远。

除徽州文书外,安徽省其他地区民间文书亦颇有遗存。据笔者对安徽师范大学馆藏文书进行统计,该馆所藏安徽文书1300件左右,大多系徽州文书,此外尚有泾县、旌德、芜湖、南陵、宁国等地文书,其中泾县文书约380余件。

## 二、福建

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福建永安县黄历乡的一间老屋,无意发现一箱达数百件的民间契约文书,福建文书开始面世<sup>②</sup>。20世纪50年代以后,福建学者们更加重视民间文书的搜集和整理。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从该省大部分地区搜集文书达4750件<sup>③</sup>。厦门大学历史系从50年

①相关资料集有:(1)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辑(明代390件,清代560件,共计950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主要辑录安徽省博物馆(888件)、黄山市博物馆(原徽州博物馆,62件)所藏徽州契约文书。(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宋元12件,明代685件,计697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主要辑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徽州契约文书。(3)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20卷,清民国编20卷,计40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徽州民间文书编撰,是迄今出版的价值最高,数量最大的徽州文书资料集。在此基础上,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将该所资料室所藏的14137件徽州文书进行了系统分类编目,形成《徽州文书类目》,由黄山书社于2000年出版。(4)周绍泉、赵亚光校注:《黟山公家议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5)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其中收录有宋至清的徽州民间文书)。(6)章有义著:《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该著辑录有48件分家阉书以及4种置产簿。(7)《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全10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主要收录明代中央档案,其中第一册辑录的文书档案中,大多系徽州文书。(8)田涛等主编:《田藏契约文书粹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据田涛个人收藏契约文书编辑,该编收录徽州民间文书数百件)。(9)陈智超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二、三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徽州民间文书编撰,该书第三册为方氏亲友手札原件影印资料集。(10)鲍传江主编:《故纸堆》,全十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该书收录有部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徽州民间文书)。(11)刘伯山主编:《徽州民间文书》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共30卷,分别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06年版、2009年版,影印本。据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徽州民间文书编辑。(12)白井佐知子编著:《徽州歙县程氏文书·解说》,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研究科21世纪COE“史资料ハブ地域文化研究据点”本部2006年,影印本。据编者在黄山市文物商店所购文书编辑。(13)詹鸣铎著,王振忠、朱红整理:《我之小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4)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民间文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据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编辑。(15)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编:《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金一清)》,财团法人东洋文库1975年刊行,辑录本。据各种文献所录契约文书编辑,其中收录有一定数量的徽州民间文书。(16)黄山学院编:《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10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陈春声:《历史·田野丛书总序——〈走向历史现场〉》,参见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③周玉英:《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和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代以来不断大力发掘各种民间文书近 3000 余件。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将福建省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乃至公安局、土地管理局、财政局、工商业联合会组织、地方志修纂办公室、政协文史办公室等政府所属的机构作为调查民间文书的重点,又最新搜集到福建各地民间文书 2341 件<sup>①</sup>。此外,福建还发掘有集中反映地域或家族的民间文书:1. 厦门契约文书。福建厦门市发现房地产契约文书 4 万余件(明代 6 件、清民国各 2 万余件)<sup>②</sup>;2. 泉州黄宗汉家族文书<sup>③</sup>;3. 泉州黄贻杼家族置业契约<sup>④</sup>;4. 林尔嘉家族及民间文书<sup>⑤</sup>;据粗略估计,目前福建陆续发掘的各地民间文书数量逾 5 万件。从刊布情况看,已知的福建文书最早系明代建文年间,然明代文书数量较少,大多数系清代民国者。类型主要以契约以及官府下发的各种票据为主,亦有议约合同、分家阉书、账簿银票以及诉讼信仰等方面文书。福建文书在反映明清土地买卖找贴,一田二主、工商业发展、家族社会、民间信仰等方面颇具地域特色。且不少文书或集中于某一地域,或凸显于某一家庭,更彰显其研究价值<sup>⑥</sup>。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福建民间文书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期刊上不断得以刊布。主要有:1. 杨国桢编:《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一)(二)(三),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 年第 1~3 期,辑录本。据厦门大学藏福建契约文书编辑。2. 陈盛明辑:《晚晴泉州“观口黄”置业契约选》,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3. 傅衣凌、陈支平:《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 年至 1988 年,其中也有不少契约文书。4. 杨国桢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增刊,辑录本(900 件),据厦门大学藏福建契约文书编辑。先后出版的文书资料集有:1. 唐文基、鹤见尚弘、周玉英编:《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辑录本。据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藏明清福建契约文书编辑<sup>⑦</sup>。2. 王连茂、叶恩典编:《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①卢增荣:《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最新搜集和论说》,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0 年)。

②这些契约文书主要收藏于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测绘档案馆,计 4 万余件,此外,厦门市博物馆馆藏 1200 余件,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藏近 1000 余件。参见孙政文:《厦门现存房地产契约文书综述》,参见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测绘档案馆网站(<http://www.xmtfj.gov.cn/gtzyfchdag/ltj/index.html>)。

③收藏于泉州市闽台关系史博物馆,参见:陈支平:《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工商业兴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④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参考文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⑤收藏于厦门鼓浪屿林尔嘉故居,已整理出版。参见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 7 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2005 年。按:林尔嘉先生系日据时期台湾爱国人士,因不愿与日本人妥协,曾内迁福建厦门鼓浪屿定居,该文书资料集中反映了林氏家族以及闽台关系方面的情况。

⑥参见:唐文基等编:《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卢增荣:《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最新搜集和论说》,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0 年);陈支平:《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2 期;陈支平主编:《福建民间文书·前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栾成显:《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载《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⑦全书分田地典卖文书(418 件)、土地典卖找价文书(268 件)、山林典卖文书(107 件)、园林典卖文书(192 件)、租佃文书(204 件)、寄佃文书(38 件)、借贷文书(241 件)、房屋厝地典卖文书(178 件)、其他经济文书(149 件),总计 1795 件。

版,据文献之中所录契约文书辑录成书。3. 陈娟英、张仲淳编:《厦门典藏契约文书》,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6 年影印本,据厦门市博物馆及社会人士收藏契约文书编辑。4. 陈支平主编:《福建民间文书》,全 6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影印本,据厦门大学藏福建地区民间文书编辑。

### 三、台湾

台湾学者多称民间文书为“古文书”,其搜集可追溯到日殖时代(1895~1945)的“土地调查”和“旧惯调查”。这一时期,“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发掘的大量台湾民间文书于《台湾私法》、《台湾土地惯行之一斑》、《台湾总督府档案》等档案汇编中多有收录<sup>①</sup>。台湾光复以来,诸如杨云萍、王世庆、张光直等学者仍继续重视发掘民间文书,并取得了重要成果<sup>②</sup>。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在民间文书的整理方面颇为突出。如 50 年代开始编印的《台湾文献丛刊》中,民间文书即得以大规模出版。90 年代以后,台湾不少市县地方政府和文化单位或借助期刊发布,或整理结集出版,文书公布更加频繁<sup>③</sup>。甚至连诸如台中县的外埔乡公所和梧栖镇公所亦委托学者整理出版其区域性文书专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关台湾民间文书的出版物达 60 余种之多<sup>④</sup>。具体如下表:

1. 临时台湾旧习惯调查会编:《契约及书简文类集》,1916 版。1973 年汲古书院再版改名为

<sup>①</sup>如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台湾私法》(1909 年),其中《附录参考书》收录契约文书达 1700 多件。整个日殖时期,搜集民间文书约 4 千余件(参见许雪姬等:《王世庆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

<sup>②</sup>杨云萍收集的民间文书,由张炎宪、曾品沧汇编成《杨云萍藏台湾古文书》,台北国史馆 2003 年;20 世纪 70 年代,王世庆在美国亚洲学会支持下,以台湾西部为主,共搜集民间文书五六千件,并结集影印了《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又称《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全十辑,每辑 12 册,共 120 册),该文书集只影印了 5 套,分别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20 世纪 80 年代,张光直发动成立“台湾史田野研究计划”,收集民间文书在 3 千余件,收藏于“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古文书室。结集出版见张炎宪、王世庆等所编的《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竹塹社》,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田野研究室 1993 年。

<sup>③</sup>据学者统计,仅 2001 至 2009 年,台湾出版的民间文书集达 40 余种。参见涂丰恩:《混乱中的秩序:台湾契约文书的搜集与分类》。

<sup>④</sup>以下关于台湾文书档案的出版信息,主要参阅陈秋坤、洪丽完:《契约文书与社会生活》,“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1 年;王世庆:《台湾民间古文书之搜集整理研究》,载王世庆:《台湾史料论文集》(上册),台北:稻香出版社,2004 年;叶钧培:《金门清代古文书研究——以契约文书为主》之“参考文献”部分(见龙腾网中华文化门户网站 2009 年);李季桦:《台湾契约文书的研究动向》(载《前近代中国的法与社会——成果与课题》,东洋文库 2009 年;涂丰恩:《混乱中的秩序:台湾契约文书的搜集与分类》;栾成显:《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载《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等。谨致谢意。



《清代契约文书及书简文类集》。<sup>①</sup>

2. [日]平山勋:《台湾社会经济史全集》,台北台湾经济史学会 1933 年(该集共 19 册,其中第 2 册系“噶玛兰地区契约文书”;第 6、7 册系“台北地方契约文书”)

3. 村上直次郎编:《新港文书》,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 1933 年;台北:幼捷出版社 1995 年重版。

4.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共 309 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59 - 1972 年。其中,《台湾私法债权编》(丛刊第 79 种)、《台湾私法商事编》(丛刊第 91 种)、《台湾私法人事编》(丛刊第 117 种)、《台湾私法物权编》(丛刊第 150 种)、《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丛刊第 152 种)等各编,均载有大量文书档案。

5. 张伟仁、王世庆等主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又称《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全 10 辑 120 册,环球书社 1977 年—1983 年影印。

6. 三田裕次藏、张炎宪编:《台湾古文书集》,台北南天书局 1988 年。

7. 张炎宪、王世庆、李季桦编:《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竹堑社》,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1993 年。

8. 邱水金等主编:《宜兰古文书》,宜兰县政府、宜兰县文化中心出版(第一辑 1994 年;第二辑 1995 年;第三、四辑系“五结张氏家藏”1996 年;第五辑 1998 年)。陈金奇:《宜兰古文书》(第 6 辑),宜兰县史馆 2004 年。

9. 洪丽完编:《台中县立文化中心藏台湾古文书专辑》(上、下),台中县立文化中心 1996 年影印。

10. 萧富隆等编:《南投县永济义渡古文契书选》,南投县立文化中心 1996 年。

11. 黄美英主编:《凯达格兰族古文书汇编》,台北县立文化中心 1996 年。

12. 陈秋坤:《台湾古契书》,台北立虹出版社 1997 年。

13. 黄富三、张秀蓉等主编:《台湾史档案文书目录》,台湾大学 1997 年。

14.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日据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文书中译本·第一辑》,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1997 年(此据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藏出版)。

15. 吴学明:《头前溪中上游开垦史暨史料汇编》,新竹县文化中心 1998 年。

16. 张炎宪主编:《竹堑古文书》,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1998 年。

17. 岸里大社文书出版编辑委员会编:《台湾大学藏岸里大社文书》(系台湾中部平埔族岸里社头目潘家留存之文书契约,全 5 册),台湾大学 1998 年。

18.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采集组编:《草屯地区古文书专辑》,南投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1999 年。

<sup>①</sup>寺田浩明:《日本对清代土地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1989 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上的发言。

19. 曾振名、童元昭编:《噶玛兰、西拉雅古文书》,台北市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1999 年。
20. 谢继昌主编:《凯达格兰古文书》,台北市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1999 年。
21. 胡家瑜主编:《道卡斯新港社古文书》,台北市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1999 年。
22. 潘是辉编:《云林古文书汇编·第壹辑》、《嘉义古文书汇编·第壹辑》,云林梅湖文化工作室 1999 年。
23. 刘泽民编:《大肚社古文书》,南投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2000 年影印。
24. 董伦岳编:《梧栖古文书史料专辑》,台中县梧栖镇公所 2000 年。
25.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采集组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北部地区古文书专辑》全 2 集,南投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2000 年。
26. 郑水萍编:《后劲记事:后劲陈三正家藏古文书编》,高雄市文化中心 2000 年。
27. 洪丽完编:《外埔乡藏古文书专辑》,台中县外埔乡公所 2001 年。
28. 刘泽民、陈文添、颜义芳编译:《台湾总督府档案平埔族关系文献选辑》(该著文书系从《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辑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2001 年。
29. 曾品沧编:《笨港古文书选辑》,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2001 年。
30. 刘泽民编:《平埔百社古文书》,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2 年版。
31. 简史朗、曾品沧编:《水沙连埔社古文书选辑》,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2002 年影印。
32. 潘英海、陈水木编:《道卡斯后垵社群古文书辑》、《道卡斯蓬山社群古文书辑》,苗栗县文化局 2002 年。
33. 林金梅编:《靖海侯施琅督垦文献辑》,台南县将军乡公所 2002 年。
34. 洪丽完编:《台湾社会生活文书专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2002 年。
35. 刘泽民编:《关西坪林范家古文书集》,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3 年。
36. 叶钧培等编:《金门古文书》全 2 辑,金门县立文化中心 2003 年、2004 年。
37. 刘泽民编:《大甲东西社古文书》(上、下册),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3 年影印。
38. 曾光正编:《左营历史照片及古文书》,高雄市政府文献会 2003 年。
39. 张炎宪、曾品沧编:《杨云萍藏台湾古文书》,台北国史馆 2003 年。
40. 潘英海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藏道卡斯古契文书图文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2004 年。
41. 刘泽民编:《台湾总督府档案平埔族关系文献选辑续编》(上、下),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4 年。
42. 陈秋坤编:《大冈山地区古契约文书汇编》,高雄县政府文献会 2004 年。
43. 唐荣源编:《古凤山县文书专辑》,高雄市政府文献会 2004 年。
44. 许文堂编:《大基隆古文书选辑》,基隆文化中心 2004 年。

45. 王春风编:《流金岁月话蓬山:通苑古文书老照片专辑》,苗栗县蓬山文教协会 2004 年。
46. 林明美等编:《北路淡水:十三行博物馆馆藏古文书》(-),台北县立十三行博物馆 2005 年影印。
47. 简史朗编:《水沙连眉社古文书研究专辑》,南投县政府 2005 年。
48. 陈荣文编:《浦边周宅古文书》,金门县政府 2005 年。
49. 彦尚文、李建兴等编:《嘉义市古文书选辑》,嘉义市政府 2005 年。
50. 郑华生、郑炯辉整理:《新竹郑利源号典藏古文书》,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5 年。
51. 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台湾总督府档案抄录契约文书》第一、二辑,全 26 册,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2006 年辑录本。
52. 林玉茹、刘序枫编:《鹿港郊商许志湖家与大陆贸易文书(1895 - 1897)》,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2006 年。
53. 陈纬一、刘泽民编:《力力社古文书契抄选辑:屏東崁顶力社村陈家古文书》,南投台湾文献馆、屏东县政府 2006 年。
54. 高贤治编著:《大台北古契字集》,全 4 集,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2002 年、2007 年影印,本书前三集从台北文献会的收藏以及《清代大租调查书》、《台湾私法》中重新辑录专属台北地域文书 1589 件。
55. 张素玢编:《苗栗鲤鱼潭巴宰族史暨古文书汇编》,台北苗栗县文化局 2007 年。
56. 林修澈编:《日阿拐家藏古文书》,台北苗栗县文化局 2007 年。
57. 杨惠仙编:《神冈一筱云吕玉庆堂典藏古文书集》,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7 年。
58. 冯明珠、李天鸣编:《台中东势詹家清水黄家古文书集》,台北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 2008 年。
59. 林正慧、曾品沧编:《李景旸藏台湾古文书》,台北国史馆 2008 年。
60. 洪丽完:《台湾中部平埔族群古文书研究与导读》,台中县立文化中心 2009 年。
61. 林玉茹编:《台南县平埔族古文书集》,台南县文化局 2009 年。

据相关学者统计,目前台湾搜集的民间文书数量在 3 万件以上<sup>①</sup>。而在文书刊布方面,台湾地区值得借鉴。以上所举的相关资料集即达 60 余种,可见已发掘的台湾民间文书相当多地已公布于世,甚至还建置有专门性的资料库,实行数字化典藏,开通古文书阅览的网络平台,为文书资料的利用提供极大便利。

<sup>①</sup>关于迄今发现台湾民间文书数量,或谓有 3 万余件,参见上引涂丰恩:《混乱中的秩序:台湾契约文书的搜集与分类》;或云 35000 余件,参见李文良:《土地行政与契约文书——台湾总督府档案抄存契约文书解題》,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04 年,第 225 页。

## 四、贵州

吉昌文书。吉昌系黔中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一个村落。明代在西南边陲设置卫所,卫所下辖屯堡,吉昌乃当时之一典型的屯堡。2008年,贵州民族学院孙兆霞教授在吉昌进行田野调查时,陆续发现一批吉昌文书(共452份),上起清雍正十一年(1733),下迄1961年,涵盖了二百多年的历史。种类涉及土地买卖、分关、继承、租借等。这批契约文书对于深入推进明代以来西南边陲的屯田制度演变、经济社会实态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sup>①</sup>。经整理,最终形成《吉昌契约文书汇编》,201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

清水江文书。在贵州东南以锦屏、天柱、黎平、三穗、剑河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系侗、苗、汉杂居地区,该流域上历史上系我国南方重要木材供应地之一。明清至民国时期,当地民众在林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大量契约文书被称作“清水江文书”。清水江文书最早发现地为锦屏县<sup>②</sup>。20世纪60年代初,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庚到锦屏侗乡苗寨田野调查,首次发现汉文山林契约。然该文书一度除杨有庚等少数学者外,并未引起政府及学界的足够关注。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唐立、武内房司等深入锦屏苗寨调查,征集了数千件文书并予以整理出版后,引起国内学术界与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sup>③</sup>。2002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和国内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及北京三联书店的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文献学的专家学者组成“中英联合田野作业考察组”到锦屏进行民间契约与传统村落专题考察,极大促进了清水江文书的发掘进程。目前,从黔东南锦屏、天柱、三穗、黎平、剑河等县发掘文书约4万余件,其中锦屏文书约占2.5万件<sup>④</sup>,据估计该区域遗存文书数量在10余万件以上。清水江文书中,明代文书较为罕见,以清代至民国时期居多,主要内容涉及山林交易、土地买卖、合伙经营、佃山造林、山林护养、环境保护、分家析产、家庭收支、纠纷诉讼、乡规民俗、官府执照、官给告示等。目前只有部分文书面世,大部分尚遗存于民间,有待发掘。清水江文书是明清民间契约文书的又一重要遗存,不少以归户形式而集中保存下来。由于系少数民族文书,特色鲜明,其对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史等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sup>⑤</sup>。

<sup>①</sup>关于吉昌文书价值参见孙兆霞、张建:《地方社会与国家历史的长时段型塑——〈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价值初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sup>②</sup>由于最先于锦屏县发现,且在该县搜集的数量亦最多,一度该地域发现的文书被称为“锦屏文书”。

<sup>③</sup>唐立、杨有庚、武内房司等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全3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

<sup>④</sup>《中国文化报》2009年5月12日。

<sup>⑤</sup>王宗勋:《从锦屏契约文书看清代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徐晓光、龙泽江:《贵州锦屏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

目前,已经出版的相关资料集主要有:1.唐立、杨有庚、武内房司等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全3卷),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版(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2.罗洪洋:《贵州锦屏林契精选》,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版<sup>①</sup>。3.锦屏县档案馆编印:《锦屏契约选辑》三辑166册<sup>②</sup>。4.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辑13册,第2辑10册,第3辑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09年、2011年影印本(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5.陈金全、杜万华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影印本(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6.贵州大学、天柱县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编纂:《贵州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第一辑(2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将于2014年出版。

## 五、浙江

浙江省民间文书尤其是契约文书在浙江省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宁波市档案馆、绍兴县档案馆等馆藏单位多有遗存<sup>③</sup>。近年来,浙江民间文书又不断被发现<sup>④</sup>。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的黄岩诉讼档案、石仓文书、宁波契约文书、龙岩档案等颇受学界关注。

**黄岩诉讼档案。**2000年7月,一场强台风向浙江省台州市袭来,该市黄岩区的一些老旧房

<sup>①</sup>辑录康熙年间(1662~1722)林契3份;卖地卖木林契18份;卖木不卖地林契10份;佃种林契21份;卖裁手林契13份;外批研究31份;卖地林契7份;分合同10份;当借抵换林契8份;其他类12份;共计133件。

<sup>②</sup>参见《中国文化报》2009年5月12日。

<sup>③</sup>(1)浙江省博物馆即收藏有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1973年,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曾到该馆抄录文书,并撰写了“清代浙江田契佃约一瞥”,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五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又参见:王兴福:《从一批契约文书看太平天国前浙江土地问题》,《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刑科题本录存不少浙江契约(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3)宁波市档案馆收藏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契约文书近千件(参见王万盈:《产权交易下的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述论》,《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3期);又参见王万盈辑校:《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据宁波市档案馆藏契约文书编辑)。(4)浙江省江山市档案馆藏有一批清代文书,以长台镇朱姓家族文书最具特色(姜志书、徐青:《一组清代家族契约档案被挖掘整理》,《中国档案》2004年第7期)。(5)据浙江绍兴档案馆所藏文书档案编辑的“绍兴县馆藏历史档案精品丛书”分为“清代档案集萃”、“商会档案集锦”、“教育档案集录”、“金融档案汇集”、“契约档案选集”,中华书局2004~2008年出版。(6)绍兴县馆藏历史档案精品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县馆藏契约档案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影印本。

<sup>④</sup>浙江宁波北仑区春晓镇民丰村周姓村民将周家祠堂装有宗谱(60册)和地契(百余份)的三个木箱捐赠给北仑博物馆,这批材料涉及明代嘉靖至民国时期周氏家族之记载(《宁波日报》2009.11.4)。(2)2009年12月2日《宁波日报》记者杨绪忠报导:浙江余姚何先生多年来收藏有浙东地区自清顺治到民国年间的土地买卖契约370张(《宁波日报》2009.12.2)。(3)张介人先生长期从省内古玩市场搜集浙东文书达400余件,并整理出版了《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屋被摧毁。就在一所坍塌的老房墙壁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文书档案。这批诉讼案卷涉及正副状纸、批单、抄单、证据、审结、甘结等较为完成的司法文书,计110余件,现大部分已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被学界称为“黄岩诉讼档案”。其后,田涛教授等又到该地做了多次的实地调查,进一步搜集了黄岩地区的大量文书及相关资料,采访了《黄岩诉讼档案》中部分当事人的后人,撰写了《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该书已于2005年出版。<sup>①</sup>

**石仓文书。**2007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到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石仓村参观古民居,在村民阙龙兴家中,意外发现了一批契约文书。后经深入调查发现,石仓村重视祖传古老契约的存传,契约文书在石仓村农家老屋里多有保存,一般不轻易示人。经协商,确定这批契约的收集整理原则,即建立专门工作室,只向村民借阅采集,扫描完毕则归还原主。部分愿出让者,也不准带出村外,而是保存在工作室里,为将来在村庄建立博物馆或展示馆作准备。目前,已收集到自明代隆庆年间至民国时期各种契约文书8000余件,内容以土地契约为主,并涉及分家书、收租簿、流水账、科仪书、杂字书、医书、商业文书等各种文书。其内容涉及诸多领域。2008年,曹树基以研究这批文书为中心,申请了上海市社科规划重大课题:《浙南山区土地契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以松阳县石仓村为中心)》,已获得立项。目前,《中国地方珍稀文献:石仓契约》(第1辑全8册,第2辑全8册)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11年、2012年出版。

**龙泉档案。**2007年,浙江大学在调研地方文书期间,在浙江相对偏僻山区——龙泉县档案馆意外发现了一批晚清民国时期地方法院遗存的诉讼档案。这批档案记载始自咸丰八年(1858),下至1949年,计17333件卷宗,88万余页。内容涉及当事人或讼师的诉状、辩诉状的原件、抄本或副状,知县、承审员或法院推事的历次判词,调解笔录,言词辩论记录,庭审口供,传票,保状,结状,领状以及各级法院、检察院、监狱等司法机构之间的来往公函等。另外,尚有作为证据的契约、分家书、婚书、系谱简图、法警的调查记录、田产山林的查勘图等等。对于研究地方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地方政治以及其他基层社会实态具有重要意义。该资料一经发现,随即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目前,“龙泉档案”已经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由中华书局与浙江大学、龙泉档案馆合作,展开充分的整理和研究,将按时段分批出版<sup>②</sup>。

## 六、广东(含海南、香港)

广东省遗存的民间文书在广东省博物馆以及广州、中山、新会、东莞、宝安、南海等市县博物

<sup>①</sup>田涛、王宏治、许传玺编撰:《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下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黄岩诉讼档案》及实地调查搜集文书编撰。

<sup>②</sup>包伟民:《晚清民国:从“大老爷”到“大法官”——“龙泉档案”见证中国基层司法百年》,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

馆、档案馆颇有度藏,另外,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孔安道纪念图书馆亦收藏有广东契约文书<sup>①</sup>。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藏有广东顺德、香山等地的土地契约<sup>②</sup>。香港许舒博士个人收藏有大量广东土地、商业、家族等类型文书,许氏所藏文书为一些学者整理后,先后出版了多种相关资料集<sup>③</sup>。近年来,广东民间文书不断被发现,如粤东梅县文书等<sup>④</sup>。

## 七、其他

北京。北京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及大专院校图书馆藏有清代京城大量房契<sup>⑤</sup>。近年来,北京大觉寺文书开始面世。大觉寺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阳台山麓的大觉寺始建于辽代,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该寺藏有一批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数百件,涉及买卖契、租佃契、典当契、借贷契、施舍赠予交换契、伙资合同、诉讼文书、寺院制度、账簿名册等类型<sup>⑥</sup>。另外,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文书中,北京文书有800余件,涉及田土卖契,典契、承佃契、房屋卖契、捐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文书中有关于清代北京水的买卖的文书,是清代北京围绕生活供水的经营(即“水钩担”)而形成的契约文书,经营权以胡同为单位而划定特定区域,每

①如谭棣华、洗剑民所编:《广东土地契约文书(含海南)》即据广东各地馆藏单位所藏500件文书辑录而成,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又,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据中山市档案局藏明清文书档案编辑。值得一提的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于20世纪60年代收集了一批清代乾隆至民国时期的广府侨乡文书,类型涉及买卖、继承、借贷、告示等。参见石坚平:《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广府侨乡契约文书研究》,《岭南文史》2009年第4期。按:“广府”指明清广州府及其统辖的州县,系广东三大侨乡之一。

②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于20世纪50年来后,通过香港搜集到数箱广东珠江三角洲文书。参见杨国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③科大卫等编:《许舒博士所辑广东宗族契据辑录》(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1987~1988年;蔡志祥编:《许舒博士所藏商业及土地契约文书:乾泰隆文书(一)潮汕地区土地契约文书》(辑录本),东京:东京大学文化研究所,1995年;刘志伟编:《张声和家族文书》(辑录本),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1999年;蔡志祥编:《乾泰隆商业文书》(辑录本),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2003年;马木池编:《北海贞泰号:商业往来文书》(辑录本),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2003年;马木池编:《北海贞泰号:1893~1935年结簿》(辑录本),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2003年。

④房学嘉先生在粤东梅县进行民俗考察时,发现数量达2000余件的清代民间文书,诸如李氏家族文书达数百件,具有很强的价值。参见房学嘉:《关于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思考——以梅县客家妇女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4期;同氏:《从李氏家藏文书看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以粤东梅县客家妇女为重点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⑤参见刘宗一主编:《北京房地产契证图集》,北京:中国奥林匹克出版社,1996年;又,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著首次整理利用北京房契达1500余件,“开辟了清代社会经济史和法制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也是迄今为止的第一部有关城市房产买卖等问题的区域性研究专著”(张传玺语)。

⑥参见:孙荣芬、张蕴芬:《大觉寺馆藏契约文书述略》,《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秦进才:《大觉寺所藏清代契约文书史料价值浅谈》,《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日从井户把水打到车上再分送给顾客的“担水人”多为山东人<sup>①</sup>。

天津。天津迄今遗存较多的是清代民国的房地契,主要保存于今天津市档案馆,数量达两万余件<sup>②</sup>。其中,有关清代民国以会馆为主体而产生的房地契资料颇为丰富<sup>③</sup>。目前出版的相关资料集有:(1)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一辑(1903~1911),第二辑(1912~1928),第三辑(1928~1937),第四辑(1937~1945),第五辑(1945~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1998年版,据天津市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2)刘海岩主编:《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据天津市档案馆藏土地契约文书编辑。(3)宋美云主编:《天津商民房地契约与调判案例选编(1686~1949)》,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据天津市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4)天津市档案馆编:《券证遗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共收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自1861年至1911年间的图片六百余幅,这些图片分别以商标、邮务、通行证及合约票据等不同类别、形式,展示了西方列强采用各种手段对天津进行的侵略和掠夺,清末天津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以及天津早期工商、邮政、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繁荣景象。

河北。1983年,朱文通先生到沧州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先后搜集到一批清代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经整理后先后予以刊布<sup>④</sup>。在此基础上,朱氏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论文<sup>⑤</sup>。张玉对其祖上遗存下来的自崇祯年间至建国初共计123份文书作了整理与研究<sup>⑥</sup>。近年来,河北省民间文书尚有发掘<sup>⑦</sup>。这些民间文书主要以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地契为主。另外,据调查,国家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及所辖各地、市档案局中都藏有不少民国时期的河北契约文书<sup>⑧</sup>。

山西。张正明、陶富海在山西襄汾县丁村一所明清建筑民宅中发现一批较为完整的土地和

①关于北京文书参见日岸本美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30年》,《史学月刊》2005.12;关于北京水买卖的文书,参见[日]熊远报:《清代民国时期的北京卖水业和“水道路”》,载《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

②参见刘海岩:《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导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③参见宋美云:《近代天津会馆房地契约与诉讼习惯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

④朱文通:《沧州文书辑存》(1~5),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1988年1~4期。

⑤参见朱文通:《清代直隶“契尾”略析》,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同氏:《有清以来沧州地契文书的几点研究》,《河北学刊》1989年第1期。

⑥参见张玉:《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述略》,《文物春秋》2005年第一期;同氏:《从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看清代直隶农村的银钱流通》,《中国农史》2005年第1期;同氏:《试论清代、民国时期冀中农村土地买卖中的契约精神——以束鹿县张氏家族土地买卖契约为例》,《河北法学》2006年第8期。

⑦参见张中:《献县发现180年前地契》,《河北日报》2003-08-07(2)。又,张玉、李秀荣:《饶阳县韩村李氏地契辑录及考释》,《文物春秋》2007年第2期。

⑧据调查,国家图书馆藏有民国时期的河北土地契约。河北省档案馆所藏“民国河北省政府建设厅”(全宗号618);“察哈尔省民国档案汇集”(全宗号672);“民国河北省一至十八专署兼保安司令部全宗汇集”(全宗号650);“民国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全宗号615)以及石家庄档案馆所藏“石家庄档案馆房地产总目”主要系民国时期河北省之民间契约文书。参见赵志云:《民国河北契纸研究——以土地契约为中心》,硕士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



房屋文书<sup>①</sup>。随着晋商研究的开展,一些山西商业文书亦被辑录出版<sup>②</sup>。

陕西。民间文书在陕西各级馆藏单位亦当有存藏<sup>③</sup>。近年来,陕西各地民间文书的发掘屡见报端。如据2007年11月20日《三秦都市报》报道,陕西省澄城县尧头镇南关村一村民在整修家中年久失修的地洞时,发现了100多份发黄的契约文书。文书的种类很多,包括地契、水契、买卖合同、村保村规等,文书跨越的年代也很长,从清康熙时起,历经各朝直到民国年间,长达200多年。澄城县地处陕西渭南,发现文书的人家是个大家族,在清代出过举人和秀才,到现在有十几辈人了。

内蒙古。1999年7月月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征集到一批契约文书,共计33张,大多保存完好。文书种类包括地契、分居字据、辞退财俸身力文约、赁房文约、辞退身力文约,皆用汉字书写。文书的时间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6)起至成纪七三九年(1945)止<sup>④</sup>。

甘肃。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文书档案是其主体,涉及科技、诉讼、契文、票证以及个人和家族档案等。其中清代及其以前档案达704卷(件),种类较多,这些档案除官文书外,有民间契文档案158卷,630件,多为买卖、典当、租赁土地、磨房、宅院和银钱借贷、承嗣、纳妾、休妻、产权继承等契约文书,另外尚有诉讼、教育、土地、家族等民国时期民间档案<sup>⑤</sup>。甘肃临夏档案已经开始辑录出版<sup>⑥</sup>。

上海。上海道契是指近代外国侵华以来,在上海的租界中,中国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人租地经商和居住的地契,因由“道台”签发,故称“道契”<sup>⑦</sup>。自1847年12月31日,上海给外国人签发第一号出租地契开始至于民国,迄今上海档案馆遗存上海道契约达三万余号,这些道契已陆续整理刊布<sup>⑧</sup>。上海道契作为研究近代上海租界史、房地产史、土地关系史、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等的重要文档资料,长期以来受到学界高度关注。20世纪30年代,面临列强侵华,民族危亡,中外学术界或着眼于收回租界,或强调“永远租佃”,围绕道契这一租界重要契证

①张正明、陶福海:《清代丁村土地文书选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②(1)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上、下部),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2002年增订本。本书辑录了档案馆、博物馆所藏以及散见于民间的山西票号文书档案资料。(2)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地方卷,全1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2007年版,其各卷之中辑有大量明清晋商文书档案。

③《陕西省清至民国文契史料》,王本元·王素芬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

④参见王晓玲、张景峰:《包头新近发现清末民国契约文书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另外,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据“甘肃档案信息网”。

⑥参见(1)马忠明:《宁定契约辑》,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档案馆1990年(内部印行)。(2)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据甘肃临夏州档案馆馆藏清代文书档案编辑。

⑦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按:该著中收录的“道契研究”一文,较早系统考察了道契的由来、程式以及道契签发、变更、废止等制度。

⑧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全3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据上海档案馆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的性质有过激烈论证<sup>①</sup>。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学术界日趋重视利用上海道契从事城市史、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研究,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sup>②</sup>。

盛宣怀档案。盛宣怀(1844~1916)系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盛氏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各种文档资料的搜集与保存,目前,仅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档案”即达17万8千余件,该档案被誉为“一座有关近代史研究的资料宝库”<sup>③</sup>。

另外,上海市档案馆保存有大量清代尤其晚晴以来的档案资料,如房地契约<sup>④</sup>。私人收藏者关注相关资料收集亦不乏其人<sup>⑤</sup>。

江苏。据杨国桢先生相关研究,江苏民间文书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仙台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均有收藏。<sup>⑥</sup>其中,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民间文书约3000件左右,大多系江苏民间文书。<sup>⑦</sup>据《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下)载,涉及江苏民间文书有:武进朱氏文书(208件)、苏州周氏文书(176件)、苏州金氏文书(171件)、通州周氏文书(341)、常熟胡氏文书(493件)、苏州文书(53件)、宝应王氏文书(222件)、金匱陈氏文书(66件)、苏州潘、贝氏文书(138条),共计1868件。

江西。据相关学者估计,现今仍存世的江西契约文书资料至少在10000件以上,主要分布在江西省博物馆以及一些地、县级文物管理单位。其中,江西省博物馆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征集的契约文书,通过初步分类整理共计1957件。时间最早的文书是雍正元年广昌县黄氏卖水

①参见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夏晋麟:《上海租界问题》,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收入于“民国丛书”第4编。

②参见沈祖炜:《房地产业和近代城市建设》,载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陈正书:《道契与道契档案之考察》,《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马学强:《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第三章,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马学强:《近代上海道契与明清江南土地契约文书之比较》,《史林》2002年第1期;夏杨:《上海道契:法制变迁的另一种表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马学强:《近代上海法租界与法租界道契》,《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③(1)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8种,题名为“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煤铁”、“甲午中日战争”、“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义和团运动”、“轮船招商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002年出版。(2)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两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④(1)上海市档案馆编:《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2)张姚俊:《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补编》(上、下),《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6期。

⑤傅为群:《老上海的当铺与当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影印。

⑥按:杨国桢先生曾在调查研究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仙台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江苏契约文书,据此,对清代江苏民间“找贴”乡例作了深入研究,撰写了《清代江苏的经帐与杜断》。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五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另外,苏州档案馆藏有近代商会档案,参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档案馆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4辑6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009年版。

⑦参见【日】岸本美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30年》,《史学月刊》2005.12;【日】浜下武志等编:《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1983、1986年。

田契,最晚的一件是公元1962年贵溪县白田公社毕家书立的宗族械斗合约书,文书产生的时间跨度长达二百四十年<sup>①</sup>。据有关学者考察,庋藏于民间的江西民间文书尚有待发掘<sup>②</sup>。近年来,南昌大学搜集婺源文书数量达1~2万件。

此外,广西、山东、云南等地亦有民间文书的遗存<sup>③</sup>。

## 八、日本关于中国民间文书的遗存与研究

日本学界关于中国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及研究的展开,与近代日本推行对东亚的殖民扩张密切相关。诸如1895年至1945年,日本统治台湾期间,大规模实施“土地调查”和“旧惯调查”,搜集了大量契约文书,汇编于《台湾私法》、《台湾土地惯行之一斑》、《台湾总督府档案》等文献中。又,近代日本为推进侵略战争而强调关于亚洲文化综合研究,在中国大力从事以东北(满洲)、华北为中心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和民间文书搜集。二战后,日本搜集的中国民间文书主要收藏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等馆藏机构。其中,仅东洋文化研究所庋藏数量即达3000件左右,系清代康熙以后的中国民间文书,以江苏民间文书居多<sup>④</sup>。此外,日本国会图书馆、九州大学、京都大学、仙台北大学等亦有收藏。日本学界整理出版了多种中国民间文书资料集<sup>⑤</sup>。

在日本学界,较早关注中国民间文书研究的学者有:玉井是博、清水金二郎、天野元之助、戒

①许智范、刘禄山:《“历史碎片”啄谈》,《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②据卞利先生回忆,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江西安远县即发现一批清代契约文书,约有八大捆,数十斤重。另外,安远县博物馆和方志办收藏有当地民间文书。参见卞利:《清代江西安远县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即藏有土地契约,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参考文献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另外,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辑:《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辑录广西土地契约百余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近年来,有学者发现山东省禹城市张家庄张氏家族有关清代嘉庆以来的契约文书,共计9份(参见张兰普:《1837~1957年的一组土地、房产、租税契据》,《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吴晓亮、徐政芸编:《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6卷8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④东洋文化研究所1941年成立,综合了法律、文学、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之学者,强调历史研究与现代社会研究相结合,附属于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亦系侵略战争期间为加强亚洲研究之产物。该所所藏中国民间文书来源主要有:学者捐赠(如仁井田陞、平中苓次所捐);古书店购买;东亚研究所移交(关于东亚研究所,是1938年由日本政府设立的关于东亚的调查机构,存续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该所在中国搜集的调查及文书等资料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80年移交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

⑤主要有:(1)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编:《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金一清)》,财团法人东洋文库1975年刊行,据各种文献所录契约文书编辑。(2)滨下武志等编:《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文献中心1983年、1986年刊行,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中国清代契约文书编辑。(3)唐立、杨有庚、武内房司等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全3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4)白井佐知子编著:《徽州歙县程氏文书·解说》,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研究科21世纪COE“史资料ハブ地域文化研究据点”本部2006年影印本,据编者在黄山市文物商店所购徽州文书编辑。

能通孝、矶田进、林惠海、仁井田陞、天海谦三郎、堀敏一、山本达郎等<sup>①</sup>。

1975年,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成立“契约文书研究会”,主要对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契约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sup>②</sup>。最初主持该研究会的为佐伯有一教授,先后从事文书整理研究的学者有:池田温(唐代敦煌文书的专家,长期从事契约文书的研究)、岸本美绪、臼井佐知子、寺田浩明、久保亨、上田信、高见沢磨、林正子等,整理结果以资料集的形式公开出版<sup>③</sup>。20世纪90年代,该研究会以岸本美绪、臼井佐知子为代表,中岛乐章、熊远报等继续从事民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sup>④</sup>。

以上系笔者依据相关资料,对遗存的宋代以后各地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情况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实际上,关于中外公私收藏的中国民间文书,或束之高阁,密而未宣者,或尚未公开,情况不明者仍不在少数。据学者估计,目前“中外学术机关入藏的明清契约文书的总和,保守地估计,也当在1000万件以上”<sup>⑤</sup>。从上文梳理情况看,20世纪我国不少地区民间文书的发现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发掘民间文书的地域可谓“满天星斗”,总体而言,南方多于北方,特别以安徽、福建、台湾、贵州、浙江、广东等地居多,类型上以契约文书为常见。另外,历经时间和水火兵燹的洗礼,宋明间的民间文书屡有面世,尤以清代民国时期的民间文书居多。随着20世纪以来各地民间文书新资料的相继面世,各地民间文书不断得以刊布。一些学者还遴选各地文书形成跨

---

①参见清水金二郎:《契的研究:关于满支土地惯例规范》,大雅堂1945年;天野元之助:《支那农业经济论》(上、下),改造社1940~1942年;戒能通孝:《支那土地法惯例序说》,载《法律社会学的诸问题》,日本评论社1943年;矶田进:《北支的租种:其特点和其法律》,载于《法学协会杂志》,1942~1943年;林惠海:《中支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的研究》,有斐阁1953年;天海谦三郎:《中国土地文书研究》,劲草书房1966年;今堀诚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序说》,劲草书房1968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著名法制史研究学者仁井田陞(1904~1966),1954~1959年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他长期从事中国民间文献与文书研究,尤关注中国契约、家族及行会等民间团体、日用类书等民间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著有《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买卖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0年,补订版1981年)、《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0年,补订版1981年)、《唐令拾遗》(1933年版)、《唐宋法律文书研究》(1937年版)等论著。

②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从1975年持续到2005年,或名“17世纪以降东亚公私文书综合研究班”(参见岸本美绪著,栾成显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30年》,《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③整理的文书资料集有: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金一清)》,东洋文库1975年;浜下武志等编:《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1983、1986年。

④中岛乐章:《明代乡村の纷争と秩序——徽州文书を史料として》,汲古书院2002年版,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10年;熊远报:《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

⑤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区域性的文书资料集<sup>①</sup>。毋庸置疑,20世纪以来,随着民间文书新资料的不断面世,国内外学界在利用和研究民间文书方面已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sup>②</sup>,然而,相对于民间文书的整理和公布而言,学术界利用民间文书进行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文书价值的认识亦有待深化。可以期待的是,对文书本身研究和利用文书从事相关研究必将继续成为学术研究之“预流”。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

①主要有:(1)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辑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和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所藏契约文书1402件。所辑除了敦煌文书外,主要系宋代以后的契约文书)。(2)田涛、〔美〕宋格文、郑秦编著:《田藏契约文书粹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辑录田涛个人收藏契约文书950件)。(3)郑焕明编:《古今土地证集藏》,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4)鲍传江、郭又陵《故纸堆》(全1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5)王支援 尚幼荣等:《故纸拾遗》(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007年(主要系陕西、山西、云南、东北、甘肃等地各种民间文书)。(6)张德义、郝毅生主编:《中国历代土地契证》,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限于篇幅,有关民间文书的利用和研究,笔者将另外撰文作考察。